

中国古诗词导读

王枝忠 主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中国古诗词导读

主 编 王枝忠

撰稿(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枝忠 吴伟斌

邹自振 欧明俊

(闽)新登字 05 号

中国古诗词导读

王枝忠主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大学印刷厂印刷

厂址:福州大学沁园 20 号 邮编:350002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9.625 印张 2 插页 23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80640-311-6

I·253 定价:1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编写说明

几年前,原国家教委明确要求各高等院校应加强大学生、尤其是非人文社科专业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尽快开设有关的选修课程。一九九五年秋起,经我校教务处与笔者所在的福州大学管理学院统一安排,笔者先后在校、院两级开设了《中国古诗词导读》选修课,并编写了讲义。到目前为止已先后开设了八期,授课讲义也几经修改完善,于是有了编写本书的基础。但是,由于笔者专业的限制,学识修养有限,以及时间、精力等关系,无法独立承担全书的编写工作。感谢吴伟斌等三位友人在百忙中给予热情支持,共同承担了全书上编的编写工作。他们都是在古代诗词方面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在此谨致谢忱。

本书具体分工如下:

吴伟斌:撰写《古代诗歌发展概述》(先秦至隋唐部分)。

邹自振:撰写《古代诗歌发展概述》(宋元明清部分)。

欧明俊:撰写《古代词发展概述》。

王枝忠:撰写《古代诗词名篇选注》、《作家小传》。

本书除可作为各高等院校非中文专业人文素质教育选修课的课本,也可作为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诗词爱好者学习古代诗词的教材。

最后,感谢海峡文艺出版社领导和部分编辑的大力支持,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帮助,才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王枝忠

一九九九年六月识于
福州大学管理学院

目 录

上编 古代诗词发展简史

第一章 古代诗歌发展概述	(3)
一、先秦诗歌	(3)
二、秦汉诗歌	(12)
三、魏晋南北朝诗歌	(16)
四、隋唐五代诗歌	(26)
五、宋代诗歌	(43)
六、元代诗歌	(55)
七、明代诗歌	(58)
八、清代诗歌	(63)
第二章 古代词发展概述	(73)
一、唐五代词	(73)
二、北宋词	(85)
三、南宋词	(103)
四、金元词	(130)
五、明清词	(137)

下编 古代诗词名篇选注

第一章 古代诗歌名篇选注 (147)

第二章 古代词名篇选注 (231)

附 录 作家小传 (279)

上 编

古代诗词发展简史

第一章 古代诗歌发展概述

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包含着许多的艺术形式,诸如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等。在文学这一条河道上,最先注入其中的“河水”是诗歌,然后才是辞赋、散文、小说、戏曲等等其他的文学样式。

中国是诗歌的王国,几千年来,产生了无数的诗人,也留下了难以数计的诗歌,给世界的文学宝库留下了无价的瑰宝。它的悠久历史万众瞩目,它的辉煌成就举世公认。

一、先秦诗歌

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先秦诗歌是它的源头。它为中国诗歌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所开创的优良传统影响千秋万代。在我国诗歌史上,没有一位诗人不受到先秦诗歌的良好熏陶,没有一代诗歌不受到先秦诗歌的全方位影响。

我们这里所说的先秦诗歌应该包括三大部分:民间歌谣、《诗经》和“楚辞”。

民间歌谣是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它最贴近当时的社会生活,最直接表达群众的思想感情。先秦的原始歌谣应该是很多的,它

应该是我国诗歌的起源,对后来的文人创作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可惜它都只是在口头流传,大多没有文字记载,因年代久远而几乎全部失传,仅仅散见于一些古代的文献之中。如《越人歌》、《齐人歌》、《麦秀歌》、《候人歌》、《孺子歌》、《宋野人歌》、《楚狂接舆歌》等即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而先秦诗歌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则是《诗经》,它自然也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产生的时间大约在二千五百年前的西周至春秋中叶的五百年间,大体上与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印度的《黎俱吠陀》及《旧约·希伯莱诗篇》相当。

它的大部分作品产生的地域在黄河流域,小部分在汉水流域。它反映的主要是黄河流域的文化特色,尤其是周朝文化的特点。

《诗经》共收入作品三百十一篇,其中的六篇仅有篇目而无作品,实际作品仅三百零五篇,通称“诗三百”。最初称《诗》,汉代儒家把它奉为至高无上的经典,乃称《诗经》,一直沿用至今。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包括作品一百六十篇;《雅》分《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共一百零五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计四十篇。

这些诗篇,最初大约是与音乐、舞蹈等结合在一起的歌唱。《墨子·公孟》篇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本意即是这些诗歌既可以诵咏,也可以歌唱,还可以演奏和伴舞。

《风》是相对于“王畿”即周王朝直接管辖地区而言,是与带有各诸侯国地方特色的音乐结合在一起的土风歌谣。除《周南》、《召南》产生于汉水流域之外,其余都是产生于黄河流域的歌谣。

《雅》是朝廷的正声,即“王畿”地区的乐歌,与《风》相对。周人

常把他们直接管辖的地区称作“夏”，而“夏”与“雅”在古代是相通的。另外，“雅”又有“正”的意思，意即王畿之乐是正声，是典范的音乐。《雅》又根据应用的不同场合及其音乐的特点，区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多是朝廷燕乐时的乐歌，而《小雅》多是下层官吏的怨刺之作，也有少数是民谣。

而《颂》则是与宗庙祭祀的音乐结合在一起，专门用来歌颂祖先功德的诗歌，可以说是我国庙堂文学的滥觞。

《诗经》中的作品，既有宫廷和官府的创作，也有经官方音乐机构收集整理的民间创作。

但是，《诗经》作品的作者，可以确指的很少。虽然有不少诗歌的内容已经表明了作者的身份，涉及普通的劳动者和士兵，还包括相当一部分的“士”和“君子”，但那是不能较真的，因为不少是作者的虚拟；即使是这样，仍然还有很多的诗歌连明确作者的身份也做不到。如果要具体指明作者的名姓，除极个别的外，则更是不可能的事情。《诗经》，尤其是《风》中的作品，其作者往往是社会性的群众，一首作品也往往不是成于一人之手。

除了《雅》和《颂》之外，《风》所涉及的作者非常复杂，地域又十分广泛。而且古代交通不便，语言的差异很大，它们又是如何汇集起来的呢？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写作风格大致统一，且大多是整齐的四言诗，用韵也大体一致，它们又是如何统一起来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说法不少，出入也很大。根据通行的说法，周王朝设有专门的采诗机构和专门的采诗官员，收集民间歌谣以观察民风民情，是他们的职责；另一方面，各国也设有同样的机构、同样的官职，他们也要收集本国的民风民俗，向周王朝进贡，以反映本地的情况。这样，许许多多的民歌民谣就逐渐地汇集到周王朝宫廷之中。面对数量庞杂、风格各异、音韵独特的诗歌，周王朝的乐官即太师自然要进行整理加工，有的淘汰，有的修改，最后形成

语言形式基本是四言体,用韵大体一致的诗歌。当然,这个过程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经过了历代太师们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艰苦劳动。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孔子是这项工作的最后完成者。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原来的诗篇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多年工作,才成了今天我们见到的“诗三百”。近年已经有人对此提出质疑,理由是在孔子之前的先秦文献中,几乎看不到三百篇以外的“逸诗”;在后记记载孔子言论的《论语》中,也同样找不到充足的证据。相反,孔子本人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诗三百”的话,可见他看到的《诗》与现存《诗经》的篇目大体相当。但不管怎样,孔子参加了对《诗经》的最后修订和删改,应该说是无任何疑义的。

《诗经》的具体写作年代,可以确定的并不多。大致说来,《大雅》的大部分和《颂》产生的年代较早,大约在西周时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是西周末年的作品;而《鲁颂》、《商颂》的全部和《国风》中的大部分,即除《邶风》及《周南》、《召南》之外,则产生稍晚,大约在周朝东迁之后到春秋中叶期间。

《诗经》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记事为主和抒情为主两大类:《周颂》和《大雅》属于第一类,《国风》则属于第二类。因作品、作者的不同而不同。《颂》诗,尤其是《周颂》,是王室的宗庙祭祀诗篇。他的主要内容除了歌颂祖先的丰功伟业之外,还有祈神谢神的乐章,《丰年》、《嘻嘻》就是明显的例子。

《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是周民族的史诗,记述了周民族的发生发展史。《小雅》中的《出车》、《常武》、《六月》等也是史诗性的叙事诗歌,描述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除此而外,还有对当时混乱政治的批评与指责,对政治前景的忧虑,对战争的厌倦,对家人的思念,如《采薇》、《何草不黄》、《瞻印》、《北山》、《十月之交》、《正月》、《大东》等就是这类作品。

《风》中的作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诗歌的内容更为广阔,更加贴近于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气息也更为浓厚,是《诗经》的精华所在。

例如《七月》,叙述农夫一年四季的生产活动,虽然只是一首农事诗,但它却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社会的种种情状,揭露社会分配的不公。又如《伐檀》、《硕鼠》、《相鼠》等,是对统治集团中尸位素餐者的辛辣讽刺,体现了下层民众对统治者的不满与怨恨,历来负有盛名,传颂不息。

《风》中的作品,不少是关于战争与劳役的诗歌,如《破斧》、《击鼓》、《伯兮》等,其中以《东山》最为著名。《东山》描写出征多年的士兵回家途中的复杂感情,既厌恶战争思念家乡,但又不直接反对战争。他想起了自己的老家,想起了自己的妻子。虽然他估计家乡已经破旧,亲人也许不复存在,但他仍然斩不断自己的无穷思念。最后八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写出从军与返家的不同感受,情真而意切,历来受到人们高度的评价。

《风》中最集中的是关于恋爱和婚姻的诗篇。如《召南·野有死麋》、《郑风·山有扶苏》、《邶风·桑中》、《卫风·木瓜》、《陈风·东门之池》、《郑风·溱洧》、《邶风·静女》、《郑风·将仲子》、《齐风·东方未明》、《魏风·汾沮洳》、《陈风·月出》、《周南·汉广》、《秦风·蒹葭》、《唐风·葛生》、《郑风·野有蔓草》以及《邶风·谷风》、《卫风·氓》、《郑风·狡童》等就是最著名的诗篇。它们涉及爱情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丰富,感情真实,风格多样,手法细腻。或者歌唱男男女女相爱之意,或者咏歌青年男女幽会的喜悦之情,或者抨击负情汉子的薄幸无情,感叹痴心弃妇的不幸遭遇……

在《诗经》里,除少数史诗和个别篇章外,抒情诗是它的主流;而且,它反映的都是现实的社会和日常的生活,几乎不涉及神话或

虚构的情节；它的基本句式是四言，偶尔也夹杂二言至九言；重章叠句，反复吟唱，造成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也是它的一个主要特色。

而《诗经》中最为后世称道的，是它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所谓“赋”，用朱熹在《诗集传》中的话来说，就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陈述和铺排。它对后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汉赋的影响很大。所谓“比”，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比喻手法。所谓“兴”，朱熹给的定义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这是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表现手法，后代诗歌中的含蓄委婉等等的表现手法即肇源于此。

在中原的诗歌逐步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时候，地处长江流域的文化也在兴起也在发展。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随着楚民族的兴起，楚文化成为这一地区的文化代表。

楚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和融合，汲取中原文化的不少长处；同时，它又保留楚文化的许多特点。由于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楚地的物力财力，明显地超过中原地区。因而，楚人的个体意识较强，情感也十分活跃，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这促使了楚地诗歌以自己的特色向前发展。

楚文化的代表之作是“楚辞”，“楚辞”曾称“屈赋”，后来为了与“汉赋”相区别，才被称为“楚辞”。“楚辞”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张汤传》，其本义是泛指楚地的诗歌。以后才成为专称，专指战国时期以楚国屈原的诗歌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新诗体，具有浓厚的楚地文化的特征：“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和宋玉以及汉代人们模仿屈、宋作品的诗歌，其书即名之曰《楚辞》。东汉时，王逸又继作《楚辞章句》。于是，长江流域的这种新诗体得以“楚辞”之名流传于世。《楚辞》是继《诗经》之

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影响深远的诗歌总集,它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确切的个人名字流传于世的诗歌专集。

在形式上,“楚辞”不同于《诗经》,它已经不再是整齐的四言诗,每句可长可短,这是对四言诗的一种解放,更适合于表达跳跃多变的情感;同时,在句中或句尾,常有语气词“兮”字夹杂其间,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在内容上,它与《诗经》也有所不同,“楚辞”中充满了浓厚的神话色彩,这与当时楚地巫教盛行有关。

从理论上来推测,“楚辞”的作者自然应该是很多很多的;但今天我们知道的代表作家,只有屈原和宋玉;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中,虽然提到过唐勒、景差的名字,可是他们的作品今天已经无从考查。我们相信,除了屈原和宋玉等人,在他们之前、同时及以后,一定还存在着一大群“楚辞”作家,但由于年代的久远,后世知道的作家仅此而已。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约生活于公元前340年至公元前278年之间,字平,战国后期楚国人。他是楚王的同姓贵族,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因此深得楚王的信任。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在楚国出任左徒这样重要的职务,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屈原怀有远大的政治理想,竭力主张举贤授能,修明法度,联齐抗秦,统一六国。他的一系列改革触犯了贵族保守势力的既得利益,因而遭到了上官大夫等人的诬陷,被楚怀王疏远,转任三闾大夫。此后,楚国的政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诗人抱着忠君爱国的初衷,进一步揭露权奸的卖国行径。这又一次触犯了权贵们,先后遭到了放逐汉北和沅湘的处分。公元前278年,楚国都城郢城被秦兵攻陷,屈原满怀悲愤,自投汨罗江而死,以身殉国。他投江的那一天可能是五月五日或者离它不远,后来人们就把五月五日作为屈原殉难的纪念日。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

《哀郢》、《怀沙》五篇。《汉书·艺文志》则说有二十五篇，除上面提到的《离骚》、《天问》外，还有《九歌》（计十一篇）、《九章》（计九篇）和《远游》、《卜居》、《渔父》。而《远游》等三篇，后人认为伪托的可能性很大。

《离骚》是屈原作品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文学的无价瑰宝。写作的具体时间虽然难于确定，但肯定是写于诗人的两次流放期间。全诗三百七十三句，二千四百九十字，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长的政治抒情诗歌，也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篇。

全诗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叙述自己的理想、品格、经历和决心；第二部分通过受谗、陈辞、叩阍、求女等一系列活动，抒发自己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第三部分则通过他人的劝导，述说自己去国与留国的矛盾斗争和最终不忍离去而决心以身殉国的过程。在这首诗中，写出了诗人与群小、诗人与楚王、诗人自己内心的种种矛盾斗争，塑造了一个高大而悲壮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在艺术成就方面，它打破了现实社会与虚幻神仙世界的界限，揉合了许多神话的传说，上天入地，自由驰骋，成为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光辉典范。

屈原的另一组重要的诗篇是《九章》，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和《悲回风》九篇，也有人怀疑《思美人》以下的四篇出于伪托，但目前尚无定论。

《九章》的内容，与《离骚》大致相似，大多与屈原的身世有关。但它们篇幅短小，所涉及的又都是具体的片断，写作也以纪实为主，很少采用虚幻的手法。其中，《桔颂》的风格特殊，采用拟人化的手法，写出它的外表、品格、才华和眷恋故土的情怀，成为后世咏物诗模仿的榜样；《涉江》是诗人放逐期间的一首纪行诗，描述了诗人流放途中艰难的历程，表现了诗人不与楚国统治集团妥协的斗争精神；《哀郢》作于公元前 278 年，诗人在流亡途中为楚都郢城的